

間接統治、虛擬自由與 交叉投票

——評羅永生《殖民家國外》

● 魯 南



殖民家國外

羅永生

OXFORD

羅永生：《殖民家國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香港學者羅永生的《殖民家國外》一書（引用只註頁碼）是他的「解殖」三部曲之一，另兩部分別是《殖民無間道》和《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①。《殖民家國外》彙集了作者2004至

2014年間在報刊雜誌發表的時評與思想隨筆，其特色是生動活潑的文筆與理論洞察的深刻相結合，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不時產生知識、智力和道德上的震撼。

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殖民主義」是「整個香港問題的要害」，但卻被各派主流政治話語迴避或簡單化。他認為1930年代到過香港的魯迅對香港殖民文化有一針見血的分析：

如何分析香港的殖民經驗（尤其是文化上的經驗）是一個重大課題，有待深研，當中最關鍵的，其實是長期支撐這殖民體制運作的「奴性結構」。這種奴性結構，在三十年代從中國來港的新文化運動健將魯迅先生筆下，有如斯的描述：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着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佞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喫苦的「土人」，能

羅永生的《殖民家國外》一書是他的「解殖」三部曲之一。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殖民主義」是「整個香港問題的要害」，但卻被各派主流政治話語迴避或簡單化。

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裔是我們的前輩。(頁5)

作者接着指出：

要了解這種奴性結構，我們不得不回溯和審視英國人的殖民統治特色，亦即著名的「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原則……提出這條英國殖民管治原則的，是曾經多番在非洲討伐土著的將軍盧押(Lugard)。他後來被派來香港當第十四任總督，在任期間並成為香港大學的創辦人，把香港大學建設成培育此等華籍的帝國代理人的地方。盧押的「間接管治」原則，從非洲、印度帶到香港，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土著紳士(native gentleman)，也就是魯迅筆下那些「高等華人」。他們雖然心儀英倫、歌頌皇室，但卻積極地利用中國人社會的那種封建奴性，把香港社會構設成一個環繞着他們這幫土著「貴族」而建成的奴才結構。(頁6)

作者對香港第十四任(1907-1912)總督盧押(Frederick Lugard)的非洲殖民統治經歷的強調，拓寬了香港殖民經驗研究的國際視野。我想在此補充的是，盧押不僅在來香港之前和之後在烏干達和尼日利亞(他的妻子「首創」了“Nigeria”這一國名)擔任殖民地管理者，而且他參加過阿富汗、蘇丹和緬甸的殖民戰爭。在任港督期間，他不僅於1911年建立香港大學以培養本地精英進行「間接管治」，而且他曾提出將英國租賃的山東半島的威海衛歸還中國，以換取對新界的永久權利。有歷史學者指出，如果當時英

國政府同意了他的「威海衛換新界」的主張，那麼1997年「香港回歸」可能會有不同的路徑。盧押在1922至1936年間又擔任英國駐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代表。從這位港督的漫長生涯的多個殖民地管理經歷中，我們也可見香港問題的深厚國際背景之一斑。當代烏干達著名政治學家和後殖民研究者馬姆達尼(Mahmood Mamdani)在關於「間接管治」的著作中也特別強調了盧押的例子②。

如果說「間接管治」和與之密切相關的「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collaborative colonialism)是羅永生從國際學術界借來統領此書各篇的一個核心概念的話，那麼另一個核心概念就是他獨創的「虛擬自由主義」：

……真正有能力來把這個「假戲真做」的「虛擬」遊戲煞有介事地演活的主要就是英國人。六四帶來的危機感使殖民者為求「光榮撤退」的任務，可以便捷地一手就掩埋了一百多年專制殖民統治的歷史，把香港重新命名為「自由社會」、「具備公民社會豐富特質」(彭定康《香港告別演說》1997.30.6.)，也以「保衛自由」的政客姿態，掩飾留下一個沒有香港人主體位置的「不民主—假自由」的議會及政治體制的事實。當然，和應着彭定康這套「虛擬自由主義」撤退大計的，就是香港的民主派政治人物，以及在別無另類想像，惟有將錯就錯地按既有遊戲規則，只求「活着」的民間力量。在九十年代以至回歸後初期，這套上下互動共同塑造的政治「潛規則」也就環繞着「自由」兩個

如果說「間接管治」和與之密切相關的「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是羅永生從國際學術界借來統領此書各篇的一個核心概念，那麼另一個核心概念就是他獨創的「虛擬自由主義」。

字，以爭取更大民主為角力點的前台之戲，卻在無聲無色之間鞏固那套彷彿就在那裏的，雖假亦真的「虛擬自由」。(頁132)

在作者看來，起源於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為了「光榮撤退」而發明的「虛擬自由主義」，為後來香港民主派「假戲真做」提供了基礎，並發展出一套被廣泛接受(甚至也包括建制派)的所謂香港殖民經驗是「有自由但沒有民主」的神話。這一否定英國殖民主義的「間接統治」導致香港人民的「主體性」被壓抑的歷史敘事，為近年來的「右翼本土主義」鋪墊了道路。作者尖銳地指出：

例如有強烈文化優越感，甚至沙文主義(chauvinism)味道的族群主義想像，香港要從中國獨立出來的想像，或者要求全民重新制訂香港憲法的想像，就依次出場……交雜在這種種新的族群自我形象的，可以是一種神話化了的中國「遺民」傳統，或時空錯置了的，重新自「冷戰時代」轉譯過來的「反共文化」，也可以是對英國殖民時期那種刻意地浪漫化的依戀與懷舊。

在本真(authentic)的本土性缺席的情況下，這種「戀殖情懷」就是當前香港以「本土政治」為名的各種右翼政治次文化共通的寫照。(頁98)

作者進一步區分了兩種「本土性」：

如果這種香港「歷史意識」萌生的運動，是源自「本土意識」的浮現，

那皇后碼頭所象徵的，正是香港作為一個城市那種開放、包容、不排除他，不作「去中國化」的「本土性」(皇后碼頭口述歷史正好追溯出多次皇后碼頭作為「保釣啟航地」的被遺忘史實)，而不是鄉土、內向、不寬容的「本土性」。(頁244)

作為一個中國大陸讀者，我很高興看到羅永生強調不作「去中國化」的「本土性」，特別認同他對香港命運和中國現代革命史密切相關的如下論述：

上世紀之初，孫中山等民國先賢，因居港而萌發當改革志士的宏願，以報中國。往後，香港人亦受惠於中國的五四運動思想啟蒙，勇於批判封建文化的精神遺毒。六、七十年代以來，本土新一代亦自國內、國外，吸收各種進步思想和精神養分，在這塊殖民地上，反抗殖民主義和它的封閉專權體制。這是跨越數代的香港人，在彼此之間互相分享、尋求自主自由的精神傳統，也是建設香港未來所本的知覺及感情想像。任何誣蔑這血脈相連的相互關係為追求分離獨立之企圖，皆為歷史的扭曲和惡毒之謠言，不攻自破。(頁124)

他認為，「將『香港認同』和『國家視野』對立，既不符合現實，也不符合歷史」(頁117)。

但大陸讀者可能會對羅永生關於1997年香港回歸後「殖民主義」仍然「陰魂不散」甚至還有所加強的論述，感到吃驚或「不自在」。這正是本書對大陸讀者知識、智力和

在作者看來，起源於末代港督彭定康為了「光榮撤退」而發明的「虛擬自由主義」為後來香港民主派「假戲真做」提供了基礎，並發展出一套被廣泛接受(甚至也包括建制派)的所謂香港殖民經驗是「有自由但沒有民主」的神話。

道德上的震撼與挑戰之一。我並不贊同羅永生所說的：勾結共謀的殖民主義的「同一套規則成功過渡九七，只是宗主國改了名字」（頁109）。我更願意相信，中央政府為了1997年「平穩過渡」而採用的一些「策略性安排」，由於法國哲學家薩特（Jean-Paul Sartre）所說的「實踐的惰性」而被過長地保留下來（如香港立法會中的功能組別）。因此，我將結合作者書中對「功能組別」的分析，並輔以改革建議，來結束本篇書評。

羅永生敏銳地注意到，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1984）後，英國殖民政府於翌年才在香港立法局引入十二名議員的「功能組別」選舉，而上海租界議會則早在1928年就接納了由「華人納稅人聯會」推選的議員。他認為這個差別來自於1925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五卅運動」：

初時，掌租界管治權的列強只答允容許華人加入一個議會外的諮詢委員會。但1925年的「五卅」慘案發生後，共產黨人發動全國運動，罷工、罷市、罷課，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浪潮。這場運動結果不單迫使外灘公園改變「禁止華人（與狗）內進」的歧視政策，更造就了新的環境，逼使上海市議會在1928年開始，兌現列強本來在六十五年前（1863）就已作出的「華人可以參與租界政事」的承諾……（頁63）

而為了支持上海的「五卅運動」，香港和廣州的工人在共產黨人鄧中夏和蘇兆徵領導下進行了歷時一年四

個月的「省港大罷工」，這是二十世紀80年代前整個世界歷時最長的罷工。羅永生評論到：

上海租界發生的「五卅」慘案，促使反帝運動全國開展，也在共產黨人的推動下令香港發生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如果當年那些死難英靈泉下有知，他們間接助成的竟只是租界市議會式的「均衡參與」、「間接選舉」，它們今日仍然支配着回歸後的香港，所冠上的竟是一套猶抱琵琶，譜系可以追溯到墨索里尼的「功能主義」名號，還甚至有人意圖將其封冊至千秋萬世行之有效的終極制度，他們也會回來報夢：「這不叫『均衡參與』，這叫『法西斯主義』！」（頁66-67）

此處，羅永生是指1929年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改組了原來按地區選舉議員的民主議會，取而代之的是一個由二十二個『功能界別』選出來的新的『法團議會』」（頁64）。

不過，我想補充指出，「功能組別」確實不能完全被認為是起源於「法西斯主義」的。根據著名政治理論家、2016年約翰·斯凱特政治科學獎（Johan Skytte Prize，該獎有「政治學的諾貝爾獎」之稱）獲得者埃爾斯特（Jon Elster）的新近研究，在從1302到1789年幾個世紀斷斷續續的法國三級會議（The Estates-General）中，基於教士、貴族和第三等級的「功能組別」都是基本的機制。有趣的是，「交叉投票」（cross-voting）一直不同程度地出現在「功能組別」的代表的選舉

大陸讀者可能會對羅永生關於1997年香港回歸後「殖民主義」仍然「陰魂不散」甚至還有所加強的論述，感到吃驚或「不自在」。這正是本書對大陸讀者知識、智力和道德上的震撼與挑戰之一。

中，即一個「功能組別」的代表的比例由另外的「功能組別」的代表選舉產生。例如，在選舉出席1789年法國三級會議的多菲內(Dauphine)省三級議會中，出席全國大會的每個等級的代表都由三個等級的代表聯合選出。埃爾斯特引用了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讚賞此「交叉投票」做法的話^③：

用此方法，每個貴族代表的選舉人中都有一些資產階級，每個資產階級代表的選舉人中都有一些貴族……如果每個等級都被如此代表，他們雖不一定達成共識，但至少可以避免過於激烈的衝突。

同時，埃爾斯特指出，美國1787年的費城「制憲會議」，也在不同程度上使用了「交叉投票」方法。更有趣的是，埃爾斯特發現，三個前英國殖民地——羅德西亞(Rhodesia，今日津巴布韋)、斐濟和塞浦路斯，明確採用「交叉投票」來解決不同族群和「功能組別」的衝突^④。

雖然這些努力不全成功，但至少比目前香港立法會的「功能組別」「單獨計票」要進步。根據馬嶽的研究，由於「工商界別」的單獨計票，使得「最低工資標準」提案在香港立法會一再受到挫折，通過的時間遠遠晚於其他「發達經濟體」^⑤。因此，在香港立法會引入「功能組別」的「交叉投票」機制，應該是一項最低公約數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值得各界別的代表和中央政府打破薩特所謂的「實踐的惰性」來認真對待。

最後，讓我引用羅永生書中如下一段我深以為然的話作為這篇書評的結尾：

他們決意以充滿自主、自尊、自豪的方式，親手建設這擺脫了殖民地宿命的現代化城市。將來，他們也會坦率地拒絕，任何以影響穩定為藉口，實質上卻復活或變相延續香港殖民統治方式的企圖。他們也反對，任何人再以類似殖民地/宗主國的關係為藍本，或以殖民者的眼光，看待和處理香港和中國的關係。香港人將會秉承多年來反殖民、求自主的精神，完成香港還未完成的「非殖民地化計劃」，按「以民為主」的原則來建立國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地方與中央的關係。(頁123)

在香港立法會引入「功能組別」的「交叉投票」機制，應該是一項最低公約數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值得各界別的代表和中央政府打破薩特所謂的「實踐的惰性」來認真對待。

註釋

① 羅永生：《殖民無間道》(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Law Wing Sang, *Collaborative Colonial Power: The Making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中譯本參見羅永生著，李家真譯：《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5)。

② 參見Mahmood Mamdani, *Define and Ru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③④ Jon Elster, *Securities against Misrule: Juries, Assemblies, Elec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7; 253-59.

⑤ 馬嶽：《港式法團主義：功能界別25年》(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3)。

魯南 政治學者，現居北京。